

迅，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是，关于1933年5月《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对鲁迅的采访。根据相关史料可以知道，申彦俊关于鲁迅谈话的记载，除了采访地点误差（鲁迅给他信明确邀请他到内山书店见面，申彦俊对采访现场环境的描写，也明显不是鲁迅家）和《中国论坛》名称等小细节的误差，总体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根据申彦俊的记载，他在采访中向鲁迅提出了“弱小民族的解放”的问题。这个提问当然是包含韩国在内的。鲁迅由此关切地问起韩国的文学状况，并热情邀请韩国文学界不论是谁，请他们为鲁迅参与编辑的《中国论坛》（采访记中误为《中国文坛》）。申彦俊的采访记中这样一段话特别值得品味：“他特意嘱托我说，朝鲜文坛上哪一位都可以，请为我现在正筹办的叫《中国文坛》的刊物撰写文章，介绍介绍朝鲜文艺的历史和现状。我希望，文坛上的有志之士特意撰写一稿，介绍一下朝鲜文坛的情况。用朝鲜文也好，或者用外国文也行，用什么文字写都可以。只要寄给笔者，就可以转交给他。”<sup>[21]</sup>

这里的《中国文坛》，应该是指《中国论坛》。一方面因为中国当时并无《中国文坛》，一方面《中国论坛》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这个刊物是美国记者伊罗生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开始是英文的，后来改为中英文合刊。伊罗生的背景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他的合作者还有史沫特莱。这个刊物不仅得到鲁迅的支持，而且得到宋庆龄的支持。伊罗生和鲁迅、史沫特莱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委会成员，而主席正是宋庆龄。这个刊物实际上是民权保障同盟掌握的刊物，鲁迅自己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在该刊发表。就在申彦俊采访鲁迅后一个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国民党的蓝衣社暗杀，《中国论坛》通过刊登国民党蓝衣社的暗杀黑名

单，揭露了当局的暴行。杨铨、鲁迅都在这个黑名单中。鲁迅告诉申彦俊，这是自己参加编辑的刊物，这说明了鲁迅跟这个刊物的密切关系。他如此郑重地请记者转告韩国文学界，邀请韩国文学界向该刊投稿，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视和热情的表示，希望与韩国文学界联手打破黑暗的法西斯统治，这也足以打破“疏离”韩国文学的印象。

这些记载说明，鲁迅早年曾经因为更加关切那些已经处于被吞并、被奴役的弱小民族，当时韩国还没有被吞并，所以没有特别关注韩国。但是也并没有无视，在有机会接触韩国文学的时候，也是有所关注的，总体上并没有忽略或者“疏离”韩国。而且从韩国被日本并吞后，鲁迅对韩国的同情与日俱增，越到后来越强烈关注韩国，只是没有机缘与韩国文化界接触。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同样遭受日本侵略，面临沦为亡国奴的危机，鲁迅更加深切地希望与韩国爱国者联手起来，以至于碰到一个记者就热切地通过他邀请韩国文学界人士向自己所参与编辑国际刊物投稿。鲁迅之所以如此热切关心韩国和韩国文学，是希望与他们联合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至于说鲁迅在韩国义士尹奉吉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轰动一时的大事都没有评论，则并不说明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军势焰嚣张，中国政府面对侵略者奴颜婢膝，谁又能公开谈论此事呢？当时实际上韩国爱国主义者在中国也更多采取了实际行动而不是诉诸舆论。而鲁迅希望韩国文学界到他参与主办的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不失为一种出于实际考量，而又能加强舆论宣传的对策。

2020年8月28日